

Making Sense of AIDS: Culture, Sexuality, and Power in Melanesia.

Leslie Butt and Richard Eves, ed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320 pp.

劉紹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閱讀 *Making Sense of AIDS: Culture, Sexuality, and Power in Melanesia* 這本既傳統又當代的書，至少有兩個不同的角度。第一是，透過人類史上全球化程度最深的疾病——愛滋病，來理解人類學的經典田野地區美拉尼西亞的社會變遷；其次，我們可將此書看做是愛滋病的比較文化與政治經濟學研究，透過美拉尼西亞的多元文化現象，來理解一個挑戰當代社會科學研究至深的單一疾病。一個經典的人類學研究地區遇到一種經典的全球性疾病，其意義發人深省。

本書係由一篇前言、一篇導論，以及十三篇論文結集而成。涵蓋的美拉尼西亞島國包括巴布亞新幾內亞、印尼屬巴布亞、新喀里多尼亞、萬那杜及索羅門群島等地。著名的醫療人類學者 Shirley Lindenbaum 撰寫的前言，是一非常精采的導讀。Lindenbaum 曾於 1960、70 年代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研究，發現了 Kuru 疾病的文化社會根源，解決了困惑醫學界多年的謎團。她對該地區以及社會醫學的熟稔與掌握，充分在她的前言中表現出來，明確點出了本書在人類學愛滋病研究上的意義與範疇。這篇前言與編者較為細膩、凸顯各章節重點的導論相得益彰。

根據本書的相關議題，我們可從第一種閱讀角度來詳談其重點。性 / 性別 / 性取向的議題是本書作者切入愛滋病的共通角度。但對其他如靜脈注射或母嬰傳播等感染途徑及其相關議題，卻未有所著墨。這個切入點，延續了美拉尼西亞在人類學研究版圖上的形象。馬林諾斯基在初步連島的性文化研究——當地土著的「性開放」，或者，與西方不同的性意識與性文化——建立了後世對巴布亞新幾內亞、甚至其他美拉尼西亞地區的刻板印象。

雖然本書作者們仍著力於傳統文化的研究領域，如性別與族群關係、宗教信仰等，但是，透過愛滋病帶來的恐懼，以及包括各地政府、基督教會與國際組織等多樣防治活動的研究，作者們展現出美拉尼西亞區域內族群差異及文化多元的現象，包括性保守、性禁忌、以及基督宗教對性文化的影響。這些描述超越了一般對當地土著「性開放」的刻板印象，也顯示出愛滋病如何影響不同族群對自身性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們對社會變遷的看法。不過，當地人及研究者對愛滋病帶來的影響並非僅抱持被動的態度，在地性文化的特質也可能用來反對主流疾病論述或強化自身性文化意識（如第十三章）。如文中引述一名巴部亞新幾內亞研究者 C. Jenkins 的話：「在匆促中推展降低愛滋病毒傳播的各項計畫時，我們必須瞭解（它們）可能會對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性文化形象產生持久性的傷害。」（頁 265）Jenkins 的醒言，指出了「性」具有容易遭受社會偏見的特質，尤其在愛滋病威脅的年代，性文化更可能成為其他結構性問題的代罪羔羊。也因此，本書作者對性文化的討論，都將之放在更大的歷史與政治經濟的變遷脈絡中，包括人口變遷、商業貿易、現代化計畫、性別關係與族群互動。而這些都是理解性文化展現及其變遷的重要因素。

在人類學的討論中，與其說愛滋病是個生物醫學的問題，毋寧說它是文化社會的產物。這是閱讀本書可採用的第二個角度，也就是比較研究的觀點。這也是編者與作者不斷強調的一點，亦即美拉尼西亞文化與歷史的特殊性。雖然本書編者強調，此書對整個太平洋地區的愛滋病研究具有前導作用，但其實，各篇文章中所探討的問題，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愛滋病研究裡都已觸及，所以其意義可說是超越地域性。愛滋病是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疾病，但此一疾病所彰顯出的地方特性也是多元且複雜。美拉尼西亞並非一個巨大同質的文化或族群體，實際上充滿了地方差異，必須透過一種「微觀流行病（microepidemics）」的觀點，才能理解愛滋病的地方表現及其影響，並藉此發展出合宜的防治對策（頁 115）。

從地方文化與全球疾病的交錯角度來看，本書說明了以往人類學家所忽視、但未來可以有所貢獻的地方。如編者所言：美拉尼西亞在傳統上是受到人類學高密度檢視的地區，但是在此區域研究的人類學家大多著眼於「傳統」文化，忽視當代社會變遷及其問題。雖然學者們多能預期愛滋病的問題遲早會衝擊當地社會，但都只是眼睜睜地看著病毒在各島嶼間蔓延，缺乏主動關注與介

入。傳統人類學家對於在地文化，尤其是性文化的瞭解，甚少對當地的愛滋病防治對策有所助益（頁22）。人類學家面對愛滋病時表現出來的被動與遲鈍，在社會科學裡是最為明顯的一門學科。此一現象在8、90年代時已成為西方人類學界的一個自我反省的重大議題。但是，這種景況至今仍存在於美拉尼西亞。這本書的出版，無疑是對此一現象的具體自我反思表現。

本書的13例個案，包含了論述分析、民族誌、甚至引入量化的研究方法（如第九章），開展且衝擊了我們對於當前愛滋病防治計畫的理解。討論的重點議題包括：地方「性禁忌」導致衛生防治人員不願提供正確的安全性行為知識（第四、五、七章）；由於當地涇渭分明的階級意識，使得精英主導了關於愛滋病的論述，而基於此論述發展出的愛滋病防治對策也經常失之偏頗，甚至在美拉尼西亞也形成了「愛滋病產業（AIDS industry）」這個全球性問題（如第六章）；甚者，殖民歷史與當代不均衡的發展經驗造成的族群界線，也影響了當地的人口遷移與生計變遷，及其與愛滋病毒傳播間的關聯（第二章）；族群衝突與對立界線也影響在地人對於愛滋病的理解與想像，這個疾病在許多地方都被認為是外來疾病，是「他者」才會得到的疾病，與自身無關（第四、五、八章）；從一般人對於愛滋病的論述，來看傳統文化轉型、新興青少年文化、地方道德戒律，與基督教對於此流行病在當代美拉尼西亞的影響等（第七、八、九、十、十一章）。

人類學家最為關注與擅長分析的「文化」，包括性文化，在愛滋病防治計畫裡，常被認為是「障礙」，而少當作進入、理解或協助發展防治措施的助益力量。這也是無數在非主流人群或非西方地區進行愛滋病防治時，造成失敗甚至惡果的原因之一。主導愛滋病論述與防治作法的，主要是醫學界與政府部門。人類學家認為這是一種「科學種族主義」（頁7）。社會科學家，尤其是擅長文化議題的人類學家的腳色尚未得到足夠重視。

雖然人類學家關注文化，但也認為文化並非不變，也並非不能適當地挪用以造福人群。如同Lindenbaum的前言結語：「我們（人類學家）面對美拉尼西亞愛滋病的能力，有賴於[與當地]文化知識的互相交流（mutual transfer）」（頁xiii）人類學需要引入正確且有效的防治知識進入當地，也需要將地方知識納入防治對策之中。施與受之間不應有文化高低之別，也不應有特定單一的知識流向。被人類學家譏稱為「公事包式概念（briefcase concepts）」（頁6）的防

治作法，就是自以為是現成的、普遍性的防治方式，終將失敗，且可能造成對當地居民及社會非預期的傷害。

整體而言，本書討論從此新興疾病的污名想像到具體防治計畫所引發的問題，羅列出各種關於愛滋病的相關社會面向。對於熟悉愛滋病議題的研究者而言，雖然討論的議題並不獨特，但可以看到美拉尼西亞各地的特殊面貌；對於不熟悉愛滋病研究的讀者來說，此書的廣度，可以協助讀者大致掌握愛滋病的社會面向。整體而言，本書適合於對公共衛生及醫療領域、美拉尼西亞、性/性取向議題有興趣的一般學者及研究生閱讀。

可惜的是本書缺乏直接與愛滋病感染者或病人接觸的經驗及討論。這是多數論述型愛滋病研究的弱點，討論了在地文化、社會結構及權力關係後，病人卻不見了。這對人類學者而言，是一個明顯的疏漏。此外，由於本書並非一本完整的民族誌，單篇的論文集形式無法呈顯出複雜的生活與社會變遷面向，對於希望透過民族誌來理解人類學愛滋病研究的讀者來說，讀完此書後可能仍會有些意猶未盡的感覺。